

意义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生成的
文化阐释

黄健◎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意义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生成的
文化阐释

黄健◎著

钱江新朝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 / 黄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ISBN 978 - 7 - 5004 - 9219 - 1

I. ①意… II. ①黄…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817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 1897 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 1920 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 1928 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直到 1998 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的母体怀抱。

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扬、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建设，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愈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作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由然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共同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 1995 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由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七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四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 50 人，其中教授 26 人（博士生导师 25 人），副教授 14 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

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三十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风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它不妨可看作是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既一方面继承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又不囿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作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这就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浙大

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缘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序

陈坚

读完黄健的《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新著，第一个印象就是“新颖”。他不是就新文学本身来论述新文学，他觉得那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式的研究，总是难以将问题阐释清楚。于是，他选择新文学生成的源头作为研究的对象，将其置于广阔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并对当时及其当今和未来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语境中，着重从“意义的失落—意义的探寻—意义的重构”的文化维度，来探讨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内在关联，探讨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先锋，在现代中国迈向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当中，是如何探寻意义的，又是如何重构意义，从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如何发生，怎样发生，作出了清晰的现代文化和文明的价值阐释。

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以往对中国新文学生成的研究，多半是从编年史的历史维度来加以探讨的，但有时囿于解读历史的观念差异，往往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同时，单一的从线性的历史思维中来探寻新文学的生成，尽管可以用已有的史料来加以说明，但仍然有可能遮蔽许多历史的真相，妨碍人们对历史真谛的探寻，对历史价值的判断，特别是使人在看似“像历史”的眼花缭乱的描述中，失去自己对历史真相透视的勇气，失去对历史真谛的思考。学术界常有“还原历史”的呼吁，但真正落实到实践的层面上，如何还原，又怎样还原？这还真是一个问题。黄健这一代学者的思路，或许与我们这一代的思路有点不一样，他们善于跳开许多所

谓历史“真相”的框框限制，摆脱诸多历史细节的纠缠，而是引进思想史、文化史的众多理念和方法来对文学本体进行认真思辨，进行深入思考，将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史的等等不同学科的主张和方法综合起来，用“多兵团作战”式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黄健跟我做博士期间，也多次与我谈过他的研究方法，虽然我不一定全都赞成，但我觉得他的这种“多兵团作战”式的研究方法，倒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方法，多维度的透视，多角度的探寻，将会获得对问题研究的立体性思维和多方位的认识与把握，从而能够更好地对问题作更深一层的审视和考量。因此，方法论的转变与更新，它不仅仅只是涉及一个单纯的研究方法问题，其背后还涉及研究者的研究理念、学识、历史观、价值观等一系列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健的这部新著，我想，他至少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是会富有新意的。

意义的失落和意义的重构，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文学作为新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无法回避这一点。在充当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历史先锋当中，新文学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学改良”，以及后来所形成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型。在这场文学运动中，新文学从新文化那里引进了许多全新的理念和价值标准，并将新文学置于意义重构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不仅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和结构范式的系列转换，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而且也给整个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意义重构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价值证明。黄健的这部新著正是抓住了中国新文学这个发展转折的历史结点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精神现象，运用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进行深入研究，这样也就另辟蹊径，对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思想成因、文化成因，作了全新的阐释，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新文学生成的独到看法，勾勒出了中国新文学生成的一幅思想图景和精神图景。

黄健的这部新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论文送审和答辩过程中，受到了专家和同行的好评。答辩评委和论文评阅人都比较一致地认为，论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深入地从中国文化转型与意义重构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思想与文化成因，学术视野开阔，立论基础扎实，思辨性强，逻辑缜密，富有学术创新性。论文着眼于新文学的新

理念、新范式、新主题、新文体、新文本结构和新的表现方式，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进行了较新颖的深度论述，揭示出了中国新文学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探讨了新文学的独特性、创新性、矛盾性、复杂性特征，并注重运用多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对所选择的问题进行多维度的论述，富有理论分析的力度和阐释的厚度。

论文答辩完后，黄健对我说他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打算对所论述的问题再作更深入的思考。我当时还担心有些观点会是不是过时，他对我说他并不担心，让思考的问题“沉静”一段时间，再思考一遍，将会获得更大的审视空间，从而能够对问题作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如今，答辩也过去了五六年，看来黄健一直都没有放松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摆我面前的这本新著，不单是一本博士论文的简单扩充版，而是融入了他这几年来的新认识和新体悟，对许多问题又作了更细致、更缜密的理论思考，完善了以前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理路。我相信，他今后将会继续沿着自己的学术道路走下去，也期待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是为序。

陈坚

2010年7月10日于启真名苑

题 辞

当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叙述主干，以宝黛爱情为叙事线索，深刻地揭示出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必将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时，那首无限伤感的《好了歌》，实际上也是为这种最终的没落，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一切旧的东西，一切不合时代发展的价值意义，都将在这曲无尽的挽歌声中无可奈何地、必然性地消亡。

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从来如此，就对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传统价值观发出了空前的质疑。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就是在这片质疑和挑战声中开启了意义重构的历史进程。因为一切失去意义的价值观念，已不足以支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摆脱困境，渴望自由、富强，重建新的精神信仰，重构新的价值世界和意义系统，置身于世界先进而强大的民族之林，乃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心声。

然而，新的意义在何方？或曰，新的意义又在哪个领域来构筑、展现？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近现代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由于传统偶像的幻灭，传统意义的消逝，将迎来的是一个没有圣贤承担道统的时代。这种局面究竟是意味着危机、衰落、崩溃、灭亡，还是意味着机遇、转折、挑战、新生？这个无法拒斥而又必须认真思考、探讨的问题，一直都萦绕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先驱者的心头，同时，也在不断地启示着后来人。正是在这个精神层面上，中国新文学为中国新文化的意义重构，充当了历史的先锋！

重新审视那个先锋时代朝气蓬勃的景象，当然不是为了历史的怀旧，而是要从历史中走出来，带着思考，带着探索，带着展望，迈向未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	(1)
题辞	(1)
导论 意义危机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	(1)
一 意义失落:一个没有圣贤担当道统的时代	(3)
二 文学革命:现代文化冲突中的一声惊雷	(11)
三 价值探寻:新文学重构意义的理念与路径	(26)
四 使命意识:中国新文学的先锋角色与特质	(38)
第一章 “立人”思想层面上的意义诉求	
——中国新文学生成的逻辑起点	(46)
第一节 意义重构的“立人”基点与视阈	(47)
第二节 “人”的文学观与“文”的自觉	(65)
第三节 悖论运思:意义的吊诡与复杂性	(84)
第二章 审美创造层面上的价值转换	
——中国新文学生成的美学建构	(103)
第一节 从古典的“和谐”到现代的“崇高”	(104)
第二节 走向“对立”:新文学审美意识的确立	(115)

意义危机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

在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意义的失落、转换和重构或曰重建，往往是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因为就一般的历史发展逻辑而言，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都会遇到有关知识谱系、价值体系、意义系统的置换问题。丹尼尔·贝尔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现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的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同时，他又指出：“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① 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

^①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帆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0、197 页。

引发意义系统的置换，其性质往往是一种“新”与“旧”的价值变化。根据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通常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看做是中国被置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①。在滚滚的全球性现代化浪潮中，中国所遭遇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这种冲击不仅仅只是表现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等层面上，同时也表现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心理等层面上。美籍华裔学者张灏认为，遭遇世界性冲击的中国文化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这种危机导致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发生深刻的危机：传统的终极关怀——以儒家基本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发生基础性动摇；精神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世界不足以支持现代人生，传统文明的失重引发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危机^②。他指出：“‘意义危机’的源头如同人类历史那般久远，而在中国一如其他的地方，对敏锐的心灵来说，生命与世界的根本意义经常是吸引人的问题。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藉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Weltanschauung and Lebensanschauung）”^③。

①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内涵有所不同。根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高级咨询专家洛威尔·布莱恩和黛安娜·法雷尔在题为《无疆界市场》（Market Unbound）的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国际化”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通常是两国之间）跨越国界的交往活动，而全球化则是指超越所有国家界线的交往活动。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将发生在 19 世纪初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产品与资本的对外扩张，以及所伴随的对外侵略与殖民活动，看做是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序幕或前奏，或者说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进程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发展，必然引发全球化的浪潮。参见 [意] 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和解释》，梁广严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 年第 7 期；张洪贵：《国内“全球化”研究综述》，《当代学术信息》1999 年第 5 期。本书赞同这一观点，并采用这种说法。

② 参见 [美]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21 世纪》（香港）1999 年第 4 期。

③ [美]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 页。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①，中国在跨入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汇，也面临着如何进行有效的价值转换和意义重构等系列问题。如果说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转化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因子，重构了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新的价值标准和意义系统，给予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在意义领域里以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意义支持，那么，一直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儒家价值系统，在转换的过程中则遭遇了空前的困境。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出现的这种现象，以及在中国社会新旧转换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意义重构的历史要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意义失落：一个没有圣贤 担当道统的时代

陈独秀指出：“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② 近代以降，意义缘何失落？又何谓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意义”一词的释义是：“意义：①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②价值；作用。”^③ 《辞源》的

① 美国社会学家 M. 列维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前者以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为典型代表，后者则包括德国、日本、俄国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者的现代化进程源自本国社会发展的内部需求，是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启动现代化的因素，则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启示效应。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者。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0页。